

思想

◇ 宗教与思想丛书 ◇

卓新平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



记忆与光照

——奥古斯丁神哲学研究

△ 周伟驰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思想文库·《宗教与思想》丛书 / 卓新平 主编

记忆与光照

De Quantitate Christi

——奥古斯丁神哲学研究

周伟驰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记忆与光照:奥古斯丁神哲学研究/周伟驰著.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4

(思想文库·宗教与思想丛书)

ISBN 7-80149-488-1

I. 记… II. 周… III. 奥古斯丁·A. (354~430) - 哲学思想 - 研究 IV. B50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437 号

思想文库·《宗教与思想》丛书

记忆与光照

——奥古斯丁神哲学研究



丛书主编: 卓新平

著 者: 周伟驰

责任编辑: 何炳济 王元佑

责任校对: 刘玉霞

责任印制: 同 非

出版发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电话 65139963 邮编 100732)

网址: <http://www.ssdph.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开

印 张: 10.25

字 数: 218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49-488-1/B·085

定价: 17.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宗教与思想》丛书



总 序

宗教作为人类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表现出人的超越自我和信仰追求。宗教属于人的灵性世界，是对宇宙奥秘、自然奥秘、生命奥秘的永恒之问。在这种询问中，我们看到了人之精神向往、灵性需求和本真信仰。因此，宗教正是人在信仰中的生活、体验、思索、感悟、行动和见证。宗教所展示的乃人类文化大树上的一朵灵性之花，从其闪烁、迷离的花影中我们可以依稀辨认出人的上下求索、人的时空漫游、人的心醉神迷、人的超凡脱俗。作为穿越永恒与现实、无限与有限之间的精神飞舟，宗教表达了人的叹息、惊讶、不安和渴求。宗教具有的这种神秘感、惊奇感和超越感，揭示出人之灵性秘密，试说着人的文化真谛和人的生命意义。诚然，宗教表现了精神、心灵之浪漫，但它作为信仰之在、信仰之感和信仰之思而体现出的强大生命力和久远流传，却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深入研究。

在当今社会，对宗教的认识研究和理解诠释已在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系统开展，对其“形”、“神”之捕捉和勾勒亦颇有成就。人们在“究天人之际”、“神人结合”之关系上，在“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理解上已窥见到宗教的一些基本特征，并且从哲学、人类

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层面探究解释了“神道设教”这一神秘而复杂的精神领域，推出了种种界说和理论。然而，对宗教的这些认识和理解仍是初步的、多元的，因其初步而需要更深入、更系统和更全面地研究，因其多元而需要不同见解之间的互识、互补、互镜和互证。我们这里编辑出版的宗教与思想研究丛书，也是要说明并进而证实这一探究的开放性和持久性。为此，在这套丛书中，我们将逐渐推出当代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一些最新研究成果、相关外文学术名著的翻译引进，以及 20 世纪上半叶问世的一批学术精品的整理再版。

宗教与思想的关系是千百年来中外思想家们反复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它为当代人的研究提供了广远的领域，亦需要其研究者具有宽阔的视野。在此，宗教与思想不仅仅论及人之“信与思”的关系，而且也涉及到人之“在与思”、“情与思”、“灵与思”等关系。人的存在是极为复杂的存在，人的本性包括性、情、意、智等诸多方面，这在宗教中均有体现。宗教与思想自然包括信仰与理性的关系，我们可在西方宗教思想史有关“信仰而后理解”、“理解而后信仰”的争论上见其端倪。然而，其论域及其引申又远远超越其限定。从宗教认知来看，人不仅具有理智和理性，而且也具有心智和灵性，“心灵”这一表述由此说明了人之理性认知的局限，以及人之信仰把握对纯理性思维的超越。正如帕斯卡尔所言，“人心有其理智，那是理智所根本不认识的”，“我们认识真理，不仅仅是由于理智而且还由于内心”。这种“心灵”或“心智”乃人之精神的奥秘所在，它表述了人的体验、人的感悟、人的惊讶和人的超越。所以，宗教之思乃是形象思维、意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的综合及结合，它说明了人之精神生活的丰富与复杂、深远与博大。

此外，如果说科学知识体现出理性的智慧，那么科学精神则不仅仅指理性精神。它也包括人之灵性中还具有的好奇、惊讶、想象、神往和超越等精神。宗教与科学在思想境界上的这种相遇，在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身上得到了典型表述。同样，中外科学家与宗教思想家如帕斯卡尔、张衡等人的思与行，信仰与实践亦给我们留下了重要的思绪和启迪。因此，我们应展开的对宗教与思想之探就不仅仅是宗教与哲学的研究，而且也包括宗教与科学、宗教与文学、宗教与文化、宗教与艺术、宗教与社会、宗教与伦理、宗教与法律、宗教与历史等领域，有着更大的涵盖。总之，我们应展示古今中外人类精神贤哲大德的思想睿智和灵性境界，介绍各种视域的所思及所获。而且，这种宗教研究的开放性亦可在“思无涯”之表述上得到印证。

对宗教与思想的认识，是对人之存在及其意义的认识；而对宗教灵性的理解亦是对自我人性的理解，是对人类及其生存时空的理解。由此可见，我们要展开的研究乃旨在一种对话，一种古今中外的对话，一种理与信、智与灵、道与言、我与你的对话：对话以求理解！对话才是人类共在之智慧。或许，这是一场没有结局的对话。但我们并不奢求某种具体的结果，而只希望有更多对话者的参与，以参与对话来参与我们所遇的世纪之交，参与一种灵性认知上的送旧迎新。“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让我们以这种心境和胸怀来参与探究人的灵性之旅，这样，真诚的对话将不会结束，客观的研究则没有穷尽，求知的追求亦永无止境。

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

卓新平

本书序



在西方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奥古斯丁被誉为第一位“西方的思想家”。作为古代基督教著名思想家和教父学集大成者，奥古斯丁继承并发扬了早期基督教思想文化传统，梳理、总结了基督教教父们的理论学说，使古代教父学臻臻完备，达到顶峰，从而为基督教思想的总体发展开辟了道路，为基督教教义神学体系的创建奠定了基础。作为欧洲古代、中世纪交接之际的哲学大师，奥古斯丁上承古希腊、罗马思想传统，下启西方中世纪和近现代精神发展。他综合利用古希腊哲学唯“理”求“知”、古罗马思想重“行”修身和古希伯来宗教守“信”敬神的文化遗产，从而完成了西方古代思想史上“知”、“行”、“信”三阶段的过渡及融通，给基督教哲学乃至整个西方哲学的发展体系和理论方法提供了重要模式。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通过奥古斯丁的努力，古代地中海世界才得以成为中古以来西方思想文化发展的“摇篮”。

奥古斯丁通过对古代文化的分析综合、改造扬弃而创立了一种全新的基督教文化体系，为西方文明的有序发展提供了“灵魂”和精神。在奥古斯丁的理论体系中，神学与哲学乃浑然天成、珠联璧合。它既体现了二者在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凝合、聚焦，又展出了其在历史学意义上的伸

延、发展。奥古斯丁为西方神学和哲学确立了一些基本原则和理论框架，其提出的科学观、时间观、物质观、存在观（或“是”论）、价值观、伦理观，以及相应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等，对二者都有着启迪和指导作用。在神学上，奥古斯丁以诠释《圣经》及古代教父著作来通古，系统提出了基督教的三一神学、历史哲学、基督论、原罪论、教会论、以及社会政治观；而其奠立的神学体系又通过阿奎那、波那文都拉、路德、加尔文和一批近现代基督教思想家而影响至今，成为整个基督教神学发展中的重要景观。在哲学上，奥古斯丁提炼并升华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柏罗丁、西塞罗等人的思想认知，形成其独特的存在论和认识论，而其关于“是”、“时”、“思”之辩证统一的论说、其阐述“所是”、“记忆”、“时间”、“自知”、“内言”等问题上所闪现的思想火花，又通过笛卡尔、康德、费希特、黑格尔、海德格尔、胡塞尔、萨特、伽达默尔等人的讨论而走向现今和未来。由此可见，要研究和了解西方思想的理论体系和基本特征，离不开对奥古斯丁思想精神的研究和了解。

周伟驰博士的《记忆与光照——奥古斯丁神哲学研究》一书，正是我国系统研究奥古斯丁思想的一部新著。他对奥古斯丁的“三一神学”、“记忆”概念，“光照”学说、“时间”理论和“是”之论说等都有着深入而独到的见解。为了这一研究，周博士不仅查阅了大量第一手文献资料和研究论著，而且还专门翻译了奥古斯丁的一些重要著述，表现出严谨的学风和刻苦钻研的精神。可以说，周博士对奥古斯丁的这一探讨，是我们在宗教与思想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颇为重要的个案研究。我国学界从总体来看对奥古斯丁的研究仍很薄弱，而要真正摸清西方思想的精神源头，了

解其所思所言的理论特色和话语特征，我们却不可能绕过奥古斯丁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及其风格独特的语言表述。因此，走近奥古斯丁绝非纯形而上意趣的“发思古之幽情”，而有着认识西方、与西方对话的重要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卓新平

2000年1月24日 于望京德君斋

序

—



伟驰的博士论文要出书了，我当然很高兴。在我的学生和几个博士生里面，他是会读书又能多读书的一个。对他想研究奥古斯丁，我一直是赞成支持的。因为奥古斯丁是基督教神哲学家中影响最重大和深远的一位顶级大师，凡想认识基督教神学深邃思想和1500年来西方哲学发展的，都绕不开他，所以以往国内对他研究很少实在是一大缺陷。可是这项研究做起来不容易，不仅要有哲学功底，更要有“三年不窥园”的埋头苦干精神。伟驰有此心和此种努力，前年写出博士论文进行答辩时，便以其优秀质量赢得了各位导师的好评。这两年来他继续钻研，译出了奥古斯丁名著《论三位一体》，对论文作了进一步加工，相信他的这些成绩会引起我国学界的关注，对开展有关研究有所裨益。

奥古斯丁以基督教神学观念吸取融会了柏拉图相论哲学思想，一方面他强调要在信仰指导下才能理解，另一方面他决不因推崇信仰而松懈理解的努力，而是以非凡的哲学工作和深刻理解力来帮助信仰。如果说前者是他的尽心的祈祷和忏悔，后者便构成了他的尽力和著作。这一信仰指导下的理解，包括由识神以识人、由识人来体悟神这两重角度两种路径的互相阐发。奥古斯丁对圣经及基督教极为虔诚，对希腊哲学又有精湛认识，他将这二者结合起来，

使自己对二者的领悟都达到了新高度。这样他对基督教神学和哲学两方面都开创了新局面：他为基督教神学中三位一体学说奠定了牢固的理论基础，而他的哲学思考不仅照亮了一千多年的基督教哲学，还为西方近代哲学创始人笛卡尔准备了深刻的洞见。伟驰在这本书中对此作了相当精细的分析，这对于我们是有重要帮助的。一般说来，我国多数学者、读者迄今对基督教及其神学所知还相当少，这种状态实在迫切需要改变，否则我们同西方将永远无法作深层次的思想文化交流。

同两年前相比，我以为论文修改中增加的对奥古斯丁本体论思想的阐发是最有意义的。本体论/ontology，顾名思义就是关于 on/being（英文）/esse（拉丁文）/存在一是（中文）的研究。更确切地说，是关于 on 本身，即 ousia/being as being/substance-essence/本体一本质的研究。这种研究是希腊哲学关注的中心，也是西方哲学一直围绕着加以发展的中心。

希腊化罗马世界在接受耶稣和保罗所传的基督教义时，经历了一个把希伯来和希腊传统融合起来的过程。信仰和理性是两种特点非常不同的智慧，因此这种结合充满着差异、对立和思想的冲突，需要反复深入的精细比较、参证和诠释的工作，才能找出克服冲突、实现优长互补和互相促进的路，得出令人信服的结果，以便至少能够在基督教内部得到共同认可的结论。这项工作若从菲洛用寓意解经法对希伯来圣经和希腊哲学相互诠释算起，经过基督教的希腊教父和拉丁教父们长期的努力，直至奥古斯丁集其大成，先后长达约 500 年。这就是所谓西方文化“两希”源泉的结合过程。奥古斯丁就处在这个结合的奠基阶段的顶点上，其意义可想而知。

奥古斯丁对基督教义的神学论证和哲学论证的结合点，就集中在这个 on/being/esse/存在一是，或 ousia/substance-essence/本体一本质的概念上。据伟驰找到的材料，奥古斯丁在著作中前后有 50 次引用了圣经《出埃及记》3: 14 的经文：上帝对摩西说：“I AM WHO I AM”（NAS 和 NI 版本英文译本）。在中文圣经和合本中，译为“我是自有永有的”。伟驰主张译为“我是我所是”。中文如何翻译涉及如何理解经文原义和原文词义的问题，不过无论如何，这个 am/sum/eimi 总是圣经经文中上帝对自己的说明或定义。其动名词的词形即是 on/esse/being。于是，圣经和希腊哲学的核心就在概念上同一、交汇了。奥古斯丁从这里论证了三位一体，论证了人可以由自己心灵的“在/是”去体验上帝的“在/是”，由追求“在/是”的真和善在认识上靠近三位一体的上帝。在这些研究论证中，他特别深入运用了柏拉图的哲学回忆说和相论的成就。伟驰本书写作原来就是对奥古斯丁这一成果的阐述，修改中他更把这个关键点（他强调只有用汉字“是”字来译和表示才合适）点明。为此他作了一些新的钻研和资料选取运用，都比原先论文更有进展。当我读到例如一（一）中他对奥古斯丁和柏拉图的“记忆”概念中所谓“是者性”的说明，二（一）中关于奥古斯丁所说的我们最确定的知识是“我知道我活着”，四（四）中奥古斯丁说上帝是“正是者”、是“正是”的观点，等等，觉得确实很要紧，得到了很好的启发。最后一章的总结性评论也是围绕着这个“是”来做的，这是很对的，用心的读者从中当能得到裨益。

我想说的一点是，由于如何理解这个 on/being/esse，或 ousia/substance-essence/本体一本质的概念，原是希腊哲学和全部西方哲学—神学中带有核心性质的大问题，而在当代

又更加突出，因此掌握不易。伟驰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意义开始钻进去努力，是很可赞许的，但是我想他还有大力继续钻研这个大问题的必要。我的这个意思，同他在后记中提到的我常常爱说的另一句话：做学问应取“眼高手低”之法，是一样的。这个话本来是贬义语，同说人“好高骛远”类似，都是对大话空想的批评。就此而言，它的用意有很对的一面。但是我想，这个话含义不清，也有些消极性的副作用：似乎毛病出在立志高、目标高，把它降下来就好，这就弊病大了。因为做人做学问的第一条就该是立志高尚，要有远大目标。没有这点而只以蝇蝇苟苟为活着的目标，在学问和事业上还能期待什么呢？当然有了高的志向，跟着来的就是必须有最切实的下手处，才能使志向和目标通过长期努力逐步落实。所以我认为这句成语可以反其义而用之，表示一种积极的做人做学问的态度和方法。作为方法，“眼高”和“手低”两头都是要严肃审慎对待，并且即使开始定得比较好也要不断下功夫体验发展的；这两端总是在联系中彼此不断促进加深的。我有了这点想法，就给我的学生们讲到过，希望他们注意这种努力，但是这决非只是对别人讲的，其实不过是自己的一点体验，并且是要继续做的。所以，“眼高手低”之法便成了我同学生们切磋共勉的话了。现在看到伟驰关于奥古斯丁和希腊哲学中有关 on/being 的论述，我想又是一个很用得着这句话的地方，需要切磋。

从罗素在 20 世纪初通过揭示 on/being 概念在语义上存在着歧义与混乱，向以往全部传统的西方哲学本体论发起了挑战以来，对这个 on 该如何理解诠释，就一直成为哲学界讨论的中心热点，它引起了许多极有意义的哲学发展，包括语义学和比较语言学的重大成就，其中海德格的存在

主义新诠释尤占重要地位。在国内，大约 60 年前陈康在翻译柏拉图的《巴门尼德》篇时，对如何准确理解和翻译这个概念提出了重要的观点，认为应当突出其“是”的含义并如此翻译才对。几十年后，王太庆和汪子嵩先生再度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们针对了流行的只把它理解和翻译成“存在”的弊病，重新突出强调译成“是”的必要性。于是主张译成“是”和主张译成“存在”，也成为国内西方哲学和希腊哲学学者中讨论的一个热点。由于我很早就深受陈康的影响感染，在北大几十年和王、汪两先生一直有着比较多和亲密的交往切磋，所以我对他们的想法了解较多较深。我认为他们突出强调 on/being 的“是”的含义和作用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如汪子嵩所说，希腊哲学的特色在“求真”，高度重视真假的分辨，便特别发展了理性的判断和推理的逻辑，因此 eimi 作为构成判断句的系词作用的“是”含义，便得到了特殊的发展。对此我是完全赞成的，15 年前我写《哲学的童年：希腊哲学发展线索研究》时已不仅遵照陈康和王太庆把柏拉图的 idea, eidos 译成“相”（批评了“理念”的译法），而且对巴门尼德和亚里士多德的文本解释提出“双读”的做法。以后也一直同王、汪两先生继续切磋，关注这个问题。不过坦率地说，真正下点功夫还是近几年逼出来的。

在陈、王、汪的提倡下，认识到这问题的重要性的已经多起来了。年轻朋友中赞同新想法的居多，伟驰便是其中之一，这个进展是让人高兴的。但是在新情况下，我也发觉事情还有另一方面也需留意。别人的暂且不说，就拿伟驰的这本书的论述来说，我就感到他对这个问题的思想学术的高度，和所要求的种种哲学的和多种语文的功底，恐怕也同大多数朋友特别是年轻朋友们那样颇为估计不足。

最为突出的一点是直接的关于译法的问题。在提出和开始扭转忽视 on/being 有“是”的含义之后，现在又出现了把它只译为“是”而不再理解成“在”、“有”、“存在”和“实在”的情况，并且似乎正在成为流行的风气。伟驰似乎也是这样，例如，在一（一），他用“是者性”（the entitative aspect）的译法来表示“记忆”的一个最重要的性质，还专门写了“重要补充”讲如此翻译的理由。可是这里要表示的正是“记忆”（它和柏拉图的“相”和奥古斯丁的上帝概念相关）的最高最真实的“存在”含义。伟驰要读者用“是者”来理解这种“存在”，这如何能让我们的读者（要知道他们是中国人！）能懂你的意思？看来伟驰自己也未见得真的觉得合适，他在接下去的解释里还是悄悄地用“记忆的实体性”译法替换了这个生造的“是者性”。¹

伟驰在突出奥古斯丁关于上帝是最高的 being 时，参考了西方某些学者的统计，据说奥古斯丁著作中反复引用圣经《出埃及记》3: 14 达五十次之多。这句经文的拉丁文英文译法是：Ego sum qui sum/I am who I am。中文和合本译为：上帝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伟驰则认为应当译为“我是我所是”，他说把上帝称作“实体”不恰当，恰当的称呼是“是”、“是者”。译成“是者”，也就包含了上帝有“实存”和“实体”的意思。对于这一点，我认为至少现在是不行的，因为现代汉语中“是”字一般只用作系词，不兼“在”、“实在”的含义。

从这段经文的希伯来原文看，“我是我所是”的翻译是不准确的。因为照《圣经希伯来文希腊文对照详明大辞典》对这句经文中所用的这个被奥古斯丁译成拉丁文 sum 亦即英文 am 的希伯来词 hayah, haw-yaw, 其原义正是其“存在”含义，to exist，而不仅是一个系词。² 并和“呼吸”即

“生存”含义联系在一起，这些都是实义动词的用法，不是单纯系动词或助动词的含义。由此可见，和合本的译法还是准确的，而伟驰的新译法倒还是值得商榷的。

提出这些想法，只供伟驰参考。目的还是为了推动我们的眼光眼力更加提高，工作入手处更趋切实。对伟驰我寄予厚望，所以当他诚恳地请求我写个序言时，我就用这种继续切磋的方式表达，希望多少对他的未来和更大成绩有所促进。是为序。

杨 适

2000年7月16日

序 二



我第一次遇见本书作者周伟驰是在 1995 年的夏天。那时我刚刚开始和北京大学哲学系进行学术交流。杨适与张志刚二位老师告诉我有一位硕士生的论文答辩快要举行了，邀请我参加。我听说论文的内容是关于奥古斯丁的三一论的，起初有点半信半疑：在国内竟还有人研究奥古斯丁？但由于三一论也是我的研究领域之一，就答应了去参加。这也算是我第一次“相信”（听信）伟驰吧。（“相信就是肯定或赞成……标示着……接受的态度，奥古斯丁所谓‘相信就是赞同地思’……”见本书第二章）。在答辩中，我特别问到国外学刊刚刚发表的一些关于奥古斯丁的观点，不是想故意刁难这个年青人，而是要看看他的应对能力；未想到他不仅对我的提问，也包括对其他老师的提问都从容不迫地作出精细的分析与思辨，难得的是，可以回答的问题他能提出一个精简的回答；不可以回答的，他也能详细地分析为何不可以回答；不懂得回答的他除了很坦率地说他未接触过某某问题之外，更愿意作出某些假定后尝试回答。我那时知道眼前的年青人不仅是可造之才，将来更会是大有作为之人。这也算是我开始“理解”伟驰吧。按奥古斯丁的讲法我是得到了光照，“亲证亲悟”了伟驰的天份。